

70
YEARS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1949-2019

新中国70年
优秀文学作品文库

中国当代重要小说
分年评介

A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JOR
NOVELS IN DIFFERENT YEARS

马振宏 / 编著

第二卷

No. 2



中国言实出版社

70
YEARS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新中国70年
优秀文学作品文库

本书是一部记录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重要小说发展脉络的“大事记”，根据一定的标准，将各年度发表的产生一定影响小说的作者、内容进行了简介，对小说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等进行了简评，并将70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撰写了概述，梳理了当代重要小说创作的发展历程，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小说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和展示。全书对当代重要小说的全局性、整体性观览，为我们了解和掌握中国当代重要小说创作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NEW CHINA
EXCELLENT LITERARY
WORKS LIBRARY

1949-2019

新 中 国 70 年
优 秀 文 学 作 品 文 库

中国当代重要小说
分年评介

A REVIEW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JOR
NOVELS IN DIFFERENT YEARS

马 振 宏 / 编 著

2

第 二 卷



中国言实出版社

作者简介

马振宏

副教授。在《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争鸣》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及学术研究文章三十余篇，参编《大学语文》一部（任副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发表中短篇小说十余篇。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中篇小说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短篇小说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中国当代重要小说分年评介》

马振宏 编著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散文卷》

梁鸿鹰 主编

《新中国70年优秀文学作品文库·诗歌卷》

李少君 主编

第二卷概述

S U M M A R Y

本卷评介的是 1977 年到 1999 年期间发表并产生影响的重要小说。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看作是中国社会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标志。

随后,文艺界也开展了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了“文革”中盛行的“阴谋文艺”“帮派文艺”以及“文艺黑线专政”论,清理了由此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给受到不公正对待和迫害的作家“落实政策”,为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品恢复名誉。1978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报》以《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为题,发表了“文化部理论组”的文章,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是粉碎“四人帮”后较早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创作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反拨。1979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6 日,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其所作的《祝词》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1980 年 7 月 2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正式提出“二为”方向,确立了“双百方针”,使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较为自由、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我国的文学艺术日渐繁荣起来。中国作家协会通过举办几种全国性的、影响很大的文学评奖活动筛选出了许多优秀小说及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评选出的小说尤其体现出了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几种文学思潮的基本面貌。

一、在“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中获奖的小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中国作协举办的中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前者始设于1978年，一共评了9届：第1届奖励1977年至1978年期间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第2届至第7届奖励1979年至1984年6年中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第8届和第9届分别奖励1985年至1986年，1987年至1988年期间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后者是在巴金的提议下设立的，只评了4届：分别奖励1977年至1980年期间、1981年至1982年期间、1983年至1984年期间、1985年至1986年期间发表的优秀中篇小说。这两个奖评选出的大多数小说是非常优秀的，认同度非常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短篇小说在文学界的地位，也反映了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在当时的重要性。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分别在1989年和1987年停评，之后“鲁迅文学奖”接续了它们。但实际上，“鲁迅文学奖”在1997年才举办了第1届评奖，评奖的范围是1995年到1996年期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所以至少在8至10年时间里没有评过优秀中短篇小说。但这几年也出现了很多被读者赞誉的小说，它们已经被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比如1989年到1994年期间出现的部分优秀中短篇小说有：

1989年

王蒙《坚硬的稀粥》、刘震云《单位》、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张承志《西省暗杀考》、林和平《乡长》、苏童《妻妾成群》等等。

1990年

赵德发《通腿儿》、权延赤《狼毒花》、池莉《太阳出世》、林白《子弹穿过苹果》、刘玉民《骚动之秋》、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王朔《给我顶住》等等。

1991年

刘震云《一地鸡毛》、苏童《红粉》、张承志《心灵史》、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陈源斌《万家诉讼》、王朔《我是你爸爸》、曹桂林《北京人在

纽约》、刘斯奋《白门柳》、陈染《与往事干杯》、林白《晚安，舅舅》、王朔《动物凶猛》等等。

1992年

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杨争光《老旦是一棵树》、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过把瘾就死》《刘慧芳》、唐浩明《曾国藩》、张炜《九月寓言》、刘醒龙《凤凰琴》、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余华《活着》、陈忠实《白鹿原》等等。

1993年

刘震云《新闻》、王安忆《纪实与虚构》、王蒙《恋爱的季节》、贾平凹《废都》、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苏童《我的帝王生涯》、莫言《金发婴儿》、杨争光《黑风景》等等。

1994年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毕淑敏《预约死亡》、何申《穷县》、韦君宜《露沙的路》、刘醒龙《菩提醉了》、关仁山《闰年灯》、张欣《爱又如何》、邱华栋《沙盘城市》等等。

上面所列的小说中只有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刘斯奋的《白门柳》、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三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涉及了诗歌、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理论评论等体裁。截至第7届(2018年8月),共评出74篇获奖中短篇小说。第1届、第2届获奖的中短篇小说共26篇,它们是第1届(1995—1996)评出的史铁生的《老屋小记》、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阿成的《赵一曼女士》、陈世旭的《镇长之死》、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池莉的《心比身先老》等短篇小说,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林希的《小的儿》、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何申的《年前年后》、李国文的《涅槃》、刘恒的《天知地知》、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阎连科的《黄金洞》、李贯通的《天缺一角》、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等中篇小说;第2届(1997—2000)评出的刘庆邦的《鞋》、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红柯的《吹牛》、徐坤的《厨房》、迟子建的《清水洗尘》等短篇小说,叶广岑的《梦也何曾到谢桥》、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铁凝的



《永远有多远》、阎连科的《年月日》、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等中篇小说（因《吹满风的山谷》发表于2000年1月，故在下卷评介）。

本卷也评介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截至第9届（2015年8月），共有43部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1982年，第1届“茅盾文学奖”（1977—1981）评出的获奖小说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1985年，第2届（1982—1984）“茅盾文学奖”评出的获奖小说是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1989年，第3届（1985—1988）“茅盾文学奖”评出的获奖小说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凌力的《少年天子》、孙力和余小惠的《都市风流》、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萧克的《浴血罗霄》（荣誉奖）、孙兴业的《金瓯缺》（荣誉奖）。1995年，第4届（1989—1994）“茅盾文学奖”评出的获奖小说是王火的《战争和人》（一、二、三）、陈忠实的《白鹿原》（修订本）、刘斯奋的《白门柳》、刘玉民的《骚动之秋》。1999年，第5届（1995—1998）“茅盾文学奖”评出的获奖小说是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一、二）。本卷评介了除姚雪垠的《李自成》（上卷已评介）之外的其他24部获奖小说，另外，在第6届至第9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活动中获奖的18部长篇小说在下卷评介。

二、20世纪80—90年代小说的书写内容

一是历史小说。这又包括好几个类型：

第一类是写古代故事的小说。如徐兴业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描写了12世纪初、中叶，宋、辽、金之间发生的民族战争；刘斯奋的三卷本长篇小说《白门柳》描写了明末农民起义及在其背景下发生的许多故事；凌力的长篇小说《少年天子》描写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君主顺治皇帝面对明清鼎革之际的混乱局面，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大力改革，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的许多故事。

第二类是反映鸦片战争之后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社会广阔历史画卷的小说。如张承志的中篇小说《西省暗杀考》写了回族几位英雄和他们英烈不屈的女人们，给从乾

隆年间到同治年间遭受血腥镇压与屠杀的几百万同胞报仇的故事；冯骥才、李定兴合著的长篇历史小说《义和拳》以1900年崛起于天津以南独流镇的“天下第一团”为中心，记述了义和团的兴衰始末。另外，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刘恒的长篇历史小说《苍河白日梦》、凌力的长篇历史小说《梦断关河》等也属于此类。

第三类是反映20世纪20—40年代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如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描写了自己家族在1934年的历史往事；王愿坚的《足迹》盛赞了周总理在长征途中伟大的革命精神；峻青的长篇小说《海啸》描写了大家洼人民顽强抗日抗匪的动人故事；曲波的长篇小说《山呼海啸》书写了东北地方民兵打击日本联队的故事；柯岗的长篇小说《三战陇海》描写了1946年至1947年期间，国共两军在陇海决战的事情；梁斌的长篇小说《翻身纪事》反映了解放区的土改；梁信的长篇小说《龙虎风云记》记述了解放初期我军与广西境内残敌作战的情况。另外还有周立波的《湘江一夜》、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曲波的《桥隆飙》、方之的《内奸》、罗旋的《红线记》、汪曾祺的《大淖记事》、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等等写的都是战争或在战争背景下发生的故事。

第四类是书写了十七年及“文革”往事的小说。这类小说所占比例很大，大概在1988年之后逐步减少。如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描写的是抗美援朝的故事；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描写了一位老警察顶着“四人帮”的强大压力，给一位善良的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萧平的《墓场与鲜花》描写了陈坚和朱少琳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朱少琳出狱后，主动到荒凉的边塞农场与陈坚生活在一起的故事；宗璞的《弦上的梦》写了女孩梁遐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和辛酸故事；齐平的《看守日记》写了“右派”分子毛乾坤指挥人们抢救出了事的锅炉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写了宋薇和罗群悲欢离合的故事；张弦的《记忆》写了电影放映员方丽茹由于一次意外的失误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故事；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讲述了三十几位高级知识分子在1967年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流放到广东罗浮山地区的悲惨遭际；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写了公社广播员赵双环和“右派分子”肖志军相爱，但木兰溪公社封建家长式的人物盘金贵却利用自己的权威，把赵双环变成了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奇货可居”的工具；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描写了一个长期不娶妻的中学教师因为在书桌中珍藏着一张女人的照片，“文革”中惨遭迫害的故事。另外，路遥的《惊



心动魄的一幕》、张林的《你是共产党员吗?》、张抗抗的《夏》、莫应丰的《将军吟》、锦云和王毅的《笨人王老大》、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王蒙的《蝴蝶》、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汪浙成和温小钰的《土壤》、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古华的《芙蓉镇》和《爬满青藤的木屋》、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张洁的《谁生活得更美好》、张长的《空谷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也属于此类。

二是反映“文革”结束以后现实生活的小说。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张天民的《战士通过雷区》都描写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贾大山的《取经》、成一的《顶凌下种》、贾平凹的《满月儿》和《二月杏》、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张石山的《辘柄韩宝山》、何士光的《乡场上》、刘绍棠的《蛾眉》、航鹰的《金鹿儿》等都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的新生活；莫伸的《窗口》、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包川的《办婚事的年轻人》、孔捷生的《因为有了她》、王润滋的《卖蟹》、柯云路的《三千万》、赵本夫的《卖驴》、迟松年的《普通老百姓》等反映了新时期的行业新风貌；于土的《芙瑞达》、樊天胜的《阿扎与哈利》写的是外域见闻；刘富道的《眼镜》、陆文夫的《献身》、祝兴义的《抱玉岩》、孔捷生的《姻缘》、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人到中年》、宗璞的《三生石》等反映的是知识分子的爱情、婚姻、工作及家庭生活等；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有德的《辣椒》、王蒙的《最宝贵的》、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金河的《重逢》、王蒙的《悠悠寸草心》、冯骥才的《啊!》、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等揭露了“文革”给人们的身心带来的伤痕，对那场运动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反思；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书写了知青的劳动生活；周嘉俊的《独特的旋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刘富道的《南湖月》、陈建功的《丹凤眼》、蒋子龙的《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水运宪的《祸起萧墙》、顾笑言的《你在想什么》等反映的是工厂里面多个方面的生活；王群生的《彩色的夜》、方南江和李荃的《最后一个军礼》描写了部队的故事；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刘厚明的《黑箭》等讲述了动物的故事；张洁的《拣麦穗》、李国文的《月食》、冰心的《空巢》、叶文玲的《心香》、戴厚英的《人啊，人!》、谭谈的《山道弯弯》、周克芹的《勿忘草》等表现了

人性和人间情等内容；李栋和王云高的《彩云归》表达了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芸、钟离汉、曾耿在台湾渴望祖国统一的愿望；益希卓玛的《美与丑》、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故事。

三、20世纪80—90年代的小说类型

从文学思潮看，20世纪80到90年代的文学思潮很多，它们基本上都来自小说领域，所以对这20多年的小说按照文学思潮来分类，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一）伤痕文学（小说）

1977年11月，《人民文学》第11期上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通过16岁的“小流氓”宋宝琦重回学校上学的曲折过程，批判了十年“文革”给人民群众在肉体和精神上造成的伤害。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了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女青年王晓华在“文革”时期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断绝关系，她在接受改造的乡下收到有关部门寄给她的、为她已逝的母亲平反的公函，她才明白一切都是骗局，她的心灵上于是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小说同样批判了“文革”。在学术界，《伤痕》因为批判了“文革”，其题目被作为所有批判“文革”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共有名字——“伤痕文学”，《班主任》被看作是这个流派的发端小说。

但据有的学者考证，出生于台湾的作家陈若曦是“伤痕文学”的奠基人。1966年10月，陈若曦在“文革”高潮中，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1974年11月，她根据自己经历的“文革”，创作了短篇小说《尹县长》，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第107期，该小说“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否定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是我国新时期‘伤痕文学’的奠基作”。^①陈若曦后来又相继创作了一系列反映“文革”题材的作品。学界还考证，陈恭敏在1978年12月号《上海文艺》（《上海文学》前身）上发表的《“伤痕”文学小议》一文很可能是国内最早公开使用“伤痕文学”概念的人。到1979年初，“伤痕文学”这个概念被使用得很普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鲍昌的《漫话“伤痕文学”》（《新港》1979年第1期）和张春予的《关于“伤痕文学”的

^① 参阅梁若梅《陈若曦创作论》，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2.1，第2、122页。



对话》(《文艺百家》1979年第1期)等。在国外,使用“伤痕文学”这个概念来指称批判“文革”的作品始于旅美华裔学者许芥昱,他在“美国加州旧金山州立大学中共文学讨论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大陆)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文学作品方面以短篇小说最为活跃,最引起大众的注目的内容,我称之为‘Hurts Generations’,就是‘伤痕文学’,因为有篇小说叫作《伤痕》,很出风头,这类小说的作者,回忆他们在‘文革’时所受的迫害,不单是心灵和肉体的迫害,还造成很大的后遗症。我把这一批现在还继续不断受人注意讨论的文学,称为‘伤痕文学’。”^①这一说法此后流传很广,也引起误解,以为“伤痕文学”术语是许芥昱创造的,其实他只是赋予了“伤痕文学”的英文译名。当年拍板发表《伤痕》的《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先生回忆道:小说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但这个外电究竟发表于何年何月何日,尚需进一步查证。^②

“伤痕文学”的出现和潮流的形成与当时人们要求从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出发,来暴露、批判“文革”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巨大危害及“在人民内部、在革命队伍里”存在的“各色各样、大大小小的官僚主义者”有关。^③

“文革”期间,当时制定的“三突出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是指导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使文艺创作偏离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文革”结束后,为了彻底肃清“三突出原则”及其他一些背离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而造成的“瞒和骗”、“假、大、空”的文学创作,人们大声疾呼恢复现实主义,即作家应该以写真实的艺术勇气,去描写十年“文革”给自己的身心带来的伤痛,去反映现实人生的真实状态,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除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外,还涌现出了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

① 叶稗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浅探》,《大陆当代文学扫描》,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第5页。

② 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3。

③ 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2.24。

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戴厚英的《人啊，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冯骥才的《啊！》、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许多作品，它们都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在“伤痕文学”创作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理论界掀起了对现实主义的大讨论。讨论主要围绕暴露与歌颂的关系、人物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关系、怎样认识“伤痕文学”等展开。讨论自然也是由具体的作品引发的。当时有人批评《伤痕》等小说是“暴露文学”。陈荒煤在1978年9月19日的《文汇报》上撰文支持了《伤痕》。

1979年8月27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主办文艺工作者座谈会，陈荒煤进一步肯定了“伤痕文学”的合法性。

“伤痕文学”的具体作品（小说）集中出现在1977—1979年间，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文革”的强烈否定和批判意识，使后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等文学现象与文学潮流都在“伤痕文学”对“文革”历史进行叙述的基础上，继续展开了新的叙述与想象，分享了共同的历史记忆，构建了相同的叙事与价值。

“伤痕文学”的创作主体是“红卫兵”或“知青”一代人，而归来的“右派”（主要是官员和知识分子）作家也创作“伤痕文学”作品，但相较而言，“伤痕文学”是最契合“红卫兵”或“知青”作家回顾“文革”的切身遭遇的，所以说，真正代表“伤痕文学”气质的，是“红卫兵”或“知青”一代的“伤痕小说”，它们是这一代人对“文革伤痕”进行追忆的艺术结晶。“红卫兵”或“知青”一代作家创作“伤痕文学”作品的素材和直接背景主要来自他们的生活，创作动力和思想资源也来自“文革”后期他们对“文革”经历的深刻记忆及反思，当他们历经波折之后，开始对自己曾参与其中或被裹挟其中的“文革”进行了批判性回顾。这是“伤痕文学”的真正源头。而且他们的这种反思不是简单的否定（尽管有时在形式上不乏这样的气息和特征），而是以革命理想为基础，对具体的“文革”过程进行了否定和批判。

从艺术审美角度看，“伤痕文学”的叙事追求“朴素”，基本的手法是融抒情、写景与叙事为一体。作家们在小说中尽情地诉说孤寂、悲哀、苦闷，赤裸裸地袒露自己的所感、所思、所欲，无所顾及地批判社会。作品充斥着对现实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彷徨，情绪普遍伤感。这种对“伤痕”的呈现，对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里发生



的各种悲剧的呈现，具有鲜明的悲剧美学风格，同时也弥漫着政治控诉的味道。但“伤痕文学”感情过于浓烈，表露有些肤浅，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太浓重，语言明显带有“文革”“左倾”的印痕，所以艺术上显得较幼稚。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伤痕文学”对“文革”的否定不够深刻，它只是从政治、社会、人际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文革”产生的原因，而缺少对传统文化心理、封建意识的分析。“伤痕文学”虽然重新出现了悲剧意识，但其悲剧精神却具有表层性的弱点，模式化的喜剧结尾淡化了悲剧效果，影响了作品的深刻性。“伤痕文学”根本就没有“纯文学”的抱负，它追求的是与正在进行的社会历史发生互动，不管作者还是读者，判断文学的尺度都是它介入历史实践的强度与深度。“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即“文革”的历史创伤，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作品的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这使它在一定的政治原因的作用下变成了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

（二）反思文学（小说）

“反思文学”是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比“伤痕文学”出现得略晚。1979年2月，茹志鹃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了短篇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这是“反思文学”的发端作品。该小说通过普通农民老寿在心里对解放战争时期、“大跃进”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的对比，尖锐地批评了“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等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给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强烈呼唤过去那种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好作风的回归。《剪辑错了的故事》发表后，出现了大量类似的作品，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方之的《内奸》等。

从文学思潮史的线索看，“伤痕文学”是“反思文学”的感情准备、感情基础，“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的发展、转化。给“伤痕文学”确立了基调、模式的“红卫兵”或“知青”作家，在“反思文学”潮流兴起之后，自然还是这一文学流派的“战将”，他们在自己作品中追问的是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这场浩劫是如何在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时期得以形成的等问题。“反思文学”的视野比重场景、重情绪的“伤痕文学”显得更开阔，它更关注历史的过程，更倾心于理性的思考，这使它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美学特征。

从“反思文学”的内容看，第一，它从政治层面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尤

其是对农村问题进行了重点反思，比之“伤痕文学”，其目光更为深邃、清醒，主题更为深刻，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比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为了群众生命而不惜触犯党纪国法的大队支书的形象，树立了新时期第一个成熟而完整的悲剧英雄形象；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则揭示了中国农民自身的性格弱点，指出这些“民族劣根性”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左倾”灾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张弦的《记忆》则以某地宣传部长秦慕平对曾经被自己错判为“现行反革命”的少女方丽茹的忏悔，反省了一个时期内不正常的“现代迷信”及很多人在这种现代迷信中所扮演的可悲角色。第二，它对“人本身”“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人道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等讴歌了人的生命力量和英雄主义精神；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等“知青小说”思考了人的生存价值问题；刘心武的《如意》呼吁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谌容的《人到中年》呼吁社会应该给中年知识分子多一点关注。第三，一些作家在“文革”后渐渐恢复了“自我解剖”的勇气，在作品中不仅对历史、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而且对知识分子、自身性格、心理弱点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如张贤亮的《唯物论者启示录》系列小说就主动、真诚、深刻地解剖了自己的灵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及1993年到1997年期间推出的“季节三部曲”也是如此。第四，书写了对自己经历的知青生活的难以忘怀，作品中洋溢着对英雄主义的赞颂；同时也对知青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网络进行了描写，揭示了冷酷甚至丑恶的“知青”生活的另一面。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张承志的《金牧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经历的知青生活的矢志不悔，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孔捷生的《大林莽》等就描写了知青所处的复杂的社会网络，揭示了冷酷甚至丑恶的“知青”生活的另一面。第五，一些小说思考了爱情的位置。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首次触及了爱情的位置这一敏感的主题，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偏僻山村中一家三个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影响着“爱情”的正常发展；航鹰的《明姑娘》通过明姑娘对因失明而消沉的青年赵灿的真诚帮助，展现了她顽强的生活热情及无私的“爱情”力量；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春天的童话》、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张洁的《方舟》等则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其



叙述口吻非常接近作者本人，从个人经历和现身说法中呼吁了爱情的位置。

可以看出，“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在内容及风格上均表现出了极大的相似性，但就“反思文学”对其给人们造成灾难的深刻的历史原因甚至文化根源的追问，还是更为深刻一些。“反思文学”试图在一个更广大的历史背景中去理解以“文革”为顶点的创伤性经验，叙事风格比“伤痕小说”也表现得更为理性。

（三）改革文学（小说）

1979年7月，蒋子龙在《人民文学》第7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改革文学”的发端作品。该小说原名《老厂长的新事》，写乔光朴毛遂自荐到一家连年亏损的电机厂当厂长，面对厂里错综复杂的矛盾，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大刀阔斧地对厂子进行了改革，终于使电机厂起死回生。小说成功地刻画了乔光朴这样一个努力地去建设和开拓新生活的改革者的形象，传达了人民的意愿，在当代工业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提炼题材的功夫。该小说发表后，书写改革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

当“反思文学”作家从“文革”之前的“十七年”追寻到造成“文革”这场大动乱的历史根源后，为了让惨痛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他们认为必须改造那些存在于现实中的滋生隐患的社会土壤。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文学”应运而生。可以说因为反思而催生了改革，反思是改革的历史依据，改革是反思的时代要求。这正是伴随“反思文学”出现“改革文学”的内在逻辑依据。“改革文学”由于反映的时代是新时期，所以明显具有与历史同步、回答时代课题的特点。基于对时代课题的清醒认识，“改革文学”把当今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观念的变革作为思想核心。凝神关注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是“改革文学”思考的精深之处。中国的改革具有历史的责任感、时代的紧迫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表达这一主题使“改革文学”激烈、昂扬；改革毕竟是一次历史的“分娩”，必然伴随着社会的“阵痛”和“血污”，况且在一个因袭沉重、根基薄弱的国度，“阵痛”会更甚、“血污”会更多——不能正视这一现实、不得不表达这一思想感情时，“改革文学”必然会出现悲凉的美学色泽。^①

在农村题材“改革文学”（小说）创作方面，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

^① 参阅王万森主编《新时期文学》（第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P16。